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KSCX2-2-03)

县域经济新空间

——从发展中的山西黎城研究中部崛起路径

调研基地：山西省黎城县县域

政策支持：黎城县委、县政府

研 究：北京圣鸿星经济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研究小组

撰 写：马珂 陈龙 高飞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县域经济新空间：从发展中的山西黎城研究中部崛起路径/
马珂等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8

ISBN 7-5017-6518-9

I. 县… II. 马…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黎城县
IV. F127.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472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邵 岩 (电话：68319114 13501108194)

责任印制：张江虹

封面设计：白长江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开 本：A5

印张：8.125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 册

书 号：ISBN 7-5017-6518-9/F·5248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中国经济书店：66162744

地 址：西四北大街 233 号

课题组组织结构

课题组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黄孟复

主任：庄炎林

委员：艾云航、黄道霞、徐向忱、王延义、卢均钦、张正儒、冯胜利

政策指导小组

组长：尚宪芳

副组长：陈鹏飞、崔彦忠

成员：王联芳、蔡雷飏、田小文、刘宝琦

课题组成员

组长：马珂

副组长：陈龙、吕文加

成员：谷源洋、温伯友、白振刚、王兴成、高飞、徐良石、杭峰、
靳麒平

调查组成员

组长：李晓东

成员：李莉、李伟玉、李登科、李魏、李明智、李彦军、李晓峰、
赵绍燕、赵金霞、赵金波、刘建丽、王大伟、王少波、王学昆、
马源、郑云波、高岷、范林林、张静、韩敏霞、任开宇、
程亮亮、郭含露

只要想到黎城人民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我心里就很不安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啥来了，是受罪来啦？受罪、受罪再受罪？马克思说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利益有关。艰苦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黎城县委、县政府整个领导班子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让黎城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这样，我们就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人生苦短，县况急，抓紧去做该做的事吧。

——中共黎城县委书记 尚宪芳

目摇摇录

前摇言	(员)
致摇谢	(员)
第一章摇中部山区县域研究基地——山西黎城	(员)
摇第一节摇自然人文环境	(员)
摇第二节摇经济发展进程	(员)
摇第三节摇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员)
摇第四节摇县域构建新经济——三山经济	(员)
摇第五节摇“十一五”发展前景	(员)
第二章摇环境不确定性中的黎城县域经济社会形态 分析报告	(猿)
摇第一节摇黎城县域经济社会情境与环境不确定性	(猿)
摇第二节摇黎城社会生活水平与居民消费观分析	(源)
摇第三节摇黎城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分析	(缘)
摇第四节摇黎城教育事业与成人教育	(远)
第三章摇黎城的“三农”问题与“林山经济”互补分析	(愿)
摇第一节摇中国“三农”问题与黎城农村改革	(愿)
摇第二节摇乡村政治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怨)
摇第三节摇农民传统意识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怨)
摇第四节摇农民负担与乡土民营	(员园)

摇第五节摇构建黎城农业特色经济——林山经济 走农业产业化之路	(员苑)
第四章摇黎城工业结构与“矿山经济”互进分析	(员苑)
摇第一节摇黎城工业结构与后发优势	(员苑)
摇第二节摇黎城粉末冶金工业分析	(员苑)
摇第三节摇黎城工业硅产业分析	(员苑)
摇第四节摇黎城多晶硅产业分析	(员苑)
摇第五节摇钢铁产业政策评估分析	(员苑)
第五章摇待兴的黎城第三产业与“游山经济”互动分析	(员苑)
第六章摇黎城县域居民社会应激事件与身心健康情况 调查结果	(员苑)
摇第一节摇调查方法	(员苑)
摇第二节摇调查结果与分析	(员苑)
摇第三节摇应激(压力)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	(员苑)
摇第四节摇建议	(员苑)
第七章摇黎城县域企业经济绩效分析	(员苑)
摇第一节摇企业经济绩效概况调查分析	(员苑)
摇第二节摇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竞争战略分析	(员苑)
摇第三节摇领导行为与管理情境分析	(员苑)
第八章摇全面增强黎城综合竞争力	(员苑)
摇第一节摇黎城综合竞争力运行现状	(员苑)
摇第二节摇增强黎城综合竞争力的总体思路	(员苑)
摇第三节摇增强黎城综合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员苑)

前 言

研究中部山区县域和选择山西省黎城县

本次对中国中部山区县域的考察，着重于地处太行山腹地——山西黎城县域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重点放在黎城县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路径以及县域发展特征，并尽可能地解释黎城县域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贡献性，指出全面增强黎城县域综合竞争力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

由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抓重点、促两头”的策略，近几年大家熟知的所谓“抓大放小”，实际上是这一策略方针的延续。改革开放 26 年的最大贡献是将国民从以往注重于政治热情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经济成为社会重中之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全民移情的倾向，引发了重城市轻乡村、重工业轻农业、重跨越轻基础的“误差转型”现象。“抓大放小”最明显的是把县域这一国家基础行政层边缘化了。这一的公共策略，反映了在体制改革中尚有巨大的空间和艰辛。

2003 年底，我提出：现在应该是重视国家经济社会基础体——县域经济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最终表现在两个领域，县域在农村；城市在社区。因为县域是中国文化的聚存源，是为国家提供基本物质的采掘源，更是提升人性情操的地理源，同时又是中国贫困的遗存源，这是国家的基础。讨论中，批评是比较强烈的。有的学者认为，县域经济只是基本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只处在补充地位，没有那么重；有的前辈认为，发展县域经济社会体的真正作用是对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移的一

个支持点，对推进发达社会促进不大，在县域毋需讲现代化。我对这些意见不敢妄评，我还是坚持：中国县域经济社会既是所属区域乃至国家社会经济的基础，又是县域所辖的镇乡村社会经济的依靠，是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宏、微观的结合处，是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目标、任务具体化的落实处。

从经济作用上来说，它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整个国家的 GDP 总量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县和县以下的经济活动创造的，不少省区县域经济所占的比例都在 51% 左右。因此，自古言“郡县治，天下安”是有深长内涵的，国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 2 000 多个县市中，至少有近百个县（市）的经济活动是获得成功的。而且，这些成功的县市，不在于它创造了 100 亿以上的 GDP，也不在于它有几十亿元的财政收入，而是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使几千万人过上了小康生活。那么，对这些成功的县，有哪些经验应该去深入挖掘、值得总结，哪些是值得借鉴的？

如：

浙江横店不临近大城市，但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在这里能积聚那么多的资产？在浙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同样地处偏远的桥头和柳市分别成了全国最大的钮扣市场、低压电器制造和集散中心；嘉善县一片森林没有，却成了全国最大的胶合板中心；海宁没有牧场也没有畜牧业，但它是全国最大的皮革制造和批发中心。

再如：

为什么这些县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方面、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和城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总共 19 亿亩耕地，9.35 亿农村居民，平均每个农民也就两亩地，农民自身生活所需留存就要一半，经济怎么发展？我国东中西三个不同地带，东部十个省市农民的人均收入是 2 700 元，中部 10 个省市自治区，农民人均收入是 1 900 元，但农业经营这块，中部比东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还多 70 元。那东部地区农民究竟富

在哪里呢？

这些疑问对于研究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当前，县域经济社会间发展的突出表现是：

1. 东部发展状况和中西部的发展落差很大。中国 2000 多个县，富的，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比他们差；穷的，公职人员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有些欠发达县域，大中型企业没有，银行、电力、电信盈利率比较稳定的行业又不归它管，原来辛辛苦苦办的地方国营企业差不多都垮了，民营的新经济又还没起来、有的才开始起步，怎么办？政府谁也找不了，只能盯着农民不放。所以县域经济不发展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农民的收入上不去、负担下不来，这是一个带有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2. 县域经济社会体在历史上就存在自主性选择空间有限和受限定性政策制约过大，导致县域自身在众多领域丧失了本应存在的聚集竞争能力和集存竞争优势的能力，致使绝大部分的优势群聚集于大中城市。让人感到迷惑的是，支持社会发展的生产资料有 3/4 来源于县域范围内，但县域经济社会体只在输出资源上作更多的贡献却无权分享优裕的现代性。最邻近资源的却掌握和应用不了资源，而远离这一范围的却在控制和占有、享受着大部分资源和由此给他们带来富裕生活和现代化优越感。

3. 县域社会经济体的地位一直是一个未能明确化的问题。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的归属统计方面，与中央统计部门是没有直接归统关系的，而是由所在的行政管辖“市”代为归统。这就是说，县域经济体的很多贡献存在着被行政管辖“市”根据其所需而被重新划分或“调整”的可能。这在现行分级体制中，的确存在着这一“黑洞”。其可能的危害性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国家利益缺损在归统的源头就开始了；另一方面，使县域经济社会体的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管理结构为三级管理模式，即中央人民政府、各省级人民政府和各县级人民政府。但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以来，出现了地改市的“行政结构改革”。因此，

县域经济体的整体利益事实上是被其行政管辖市掌握和“变异”了，并已直接影响到国家目前推出的“统筹与协调”战略。更值得关注的是，各县域经济社会体为求发展和完成每年度上一级布置的战略目标和政绩指数，决策者们相互间进行搏击竞争，制造出一个县域比一个县域更优惠的土政策。而这一些相继出台的土政策中更多的是怎样回避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应法规和政策条例而制定的变形政策，以牺牲国家利益和当地资源以及在数字上做文章来达到完成任务（政绩）指标，以获取上级政策倾斜和满足个人仕途的欲望。

体制建设的不确定性对县域发展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存在是有其体制原因的，因为建立和运用体制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达到两种满足，一是追求社会规范和有序，经济利益符合社会利益和政权意识；二是追求众人的意识符合政权意识。说到底追求管制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工具，以制约人的意识，有目标性地引导人对事态识别思维的合聚化为己任。如有一个科技创新实例，就可充分说明不同的体制产生出不同的意识文化和作用。

如：

2004年2月，CCTV报道，以色列推出一种汽车安全装置，它的作用是提示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能够十分准确地知道前方物体与行驶车之间的距离，并将前方车辆、周边环境物像和距离用图像和数字在车内的显示装置上标出，同时有语音阅读距离数据，如同电视一样。当接近危险距离时，如驾驶人还未作出相应的反应，该装置就会在最安全的距离内采取强硬措施，将行驶中的汽车核心动力即时关闭，使车辆停止行驶，避免事故发生。2004年2月，BTV报道，北京推出了一项汽车事故记录安全装置，据称与飞机的黑匣子相似，主要作用是记录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如发生事故，起到记录驾驶人反映和处理的行为过程。据称，如驾驶人有酒

后驾车的嫌疑，这个匣子中的记录分析还可作为一种证明。中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提倡大型货车都应安装这一装置。

同样是对汽车安全支持的创新科技产品，但在应用、服务、目的方面完全不同。如把这两个原创意识作用放到体制领域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原创者的思维受到不同体制的直接影响。前者的原创精神应该属提供型的，以人的价值为最高准则；而后一种是控制式的，是以查处、控制为主要目的。正如我过去在中德科技交流中心召开的“中国中长期科技规划”讨论中所谈到的“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科技概念是多元的，许多民用科技产品在实验室里和生产线上是不带政治涵义的，可是，一旦进入市场，在应用过程中，它的政治意义就自然地出来了。

若从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各类现象来观察中国体制，在众多领域都未能表现出自信和有效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各阶层提供更多的新需求，背负过重，致使很多优秀的积极的社会元素无法进入正统轨道。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各群体对政治、经济、文化提出更高更多的希望，许多创新元素在创造过程中碰到了其对社会作用中的合理要求而无法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因为法律本身也遇到了同样体制缺陷的尴尬。这种需要更新而又更新程度不够的作用力对社会新需求补充不足的现象，已不是一年二年，而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面临着的，甚至出现由于体制的因素而将众多问题长期拖延下来，久久得不到正确有效的解决。政府机构门前时常出现的上访族就可归结到这一因素内。

当然，在社会运动中，的确存在着政策和法律滞后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无论如何，补充和创新的过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距离以及“跟进力”不能太慢、太大和太弱，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它是民众考察政府观念的先进性、执政水平的高低和政府创新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目前所执行的体制在众多方面，如行政模式和行政功能、行政行为方式及行为能力的表现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仍十分相近，区别不大。而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市场经济“内质”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市场结构、民众意识、经济营运模式、商务行为、社会道德标准等众多方面都已与国际建立要约并作为参照（物）体；各类参与市场经济领域的行为人、各类经济市场化的经济体已融入国际经济意识范畴并已与其达成了共盟，而所属这一范畴内、本应该共同去执行这一经济体制模式的行政行为者，却距离越来越远。

对县域发展水平的重新解释

中国疆辽资博，地腹渊深，文化与地域的联系力极强；资源分布参差不齐，区域间的文化、经济、人文结构特征各不相同。各种不相同的体现，反映在经济的量上，文化的差异上，意识的不同认知感上以及形而上学的多元认识上。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导致经济发展在速度和量的增长上的不同，并因为这些个元素的发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了质的不同，也就有了现在称为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

对中国县域经济社会间出现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性形态认知，应该是：发达与不发达应是相对的，它们都处在发展之中。故“不发达”不应被单纯地解释为“落后”，从更多的层面上去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欠发达地区应是隐含着潜在的尚未开发或有待增强开发能力的经济低谷区。因为其与发达地区的相距程度只能表明两者只是处在两个各具特征的世界，发达地区的先进模式不能代表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所具有的特征性。这一理论说明了“发达”与“不发达”在发展中只是存在“质”的差异。它们间要改变或者说应该提升的是“质”而不仅仅是“量”，“量”其实是第二位的。关键是如何获取和具备、处理和解决当下面临的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这比如何寻求促进发展要难得多得多。

以往中央对全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关注也存在着视点不平衡问题，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指导性思想才对这一问题进行合理修正。尤其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若干问题的决定》扫清了最终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障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资产合法性方面，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在股份制身份合法性方面，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私、民营资本禁区开放合法性上，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中国深层次经济改革的大门由此洞开。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战略部署，中国县域经济社会体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提升、转型、新机遇和新挑战。一个县域经济社会体是否能够建立起“跨越或衰退”的预测机制应已成为县域经济体的决策者们更加关注的核心点之一。

县域的经济社会压力主要来自于农村，县域决策者们的主要精力主要也放在这一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多人口，农业人口就有9.35亿，占总人口的73%，即使加上县城和小城镇，全国城镇化的比重也只有37%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0个百分点。（资料来源：《200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家经济备忘录》）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的县域经济社会体承担着全社会的73%的压力，而它们所得到的是比世界平均低10个百分点的回报，实况与认同极不对称。就中国传统认识，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安定则天下安定。这些道理先哲们早就告知我们了。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一直在延续并日益突出。中国农民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长期劳作所积累的结果，绝大部分是靠世代口述意传下来的。至于现代性的辨别是非曲直，坚持正确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能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以及积极参与管理和正确处理农村社会事务的能力都有待觉悟和提高。针对上述重要，也是为了缓解这种“重要”的张力，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从九个方面明确了农村工作思路和任务。中央的决定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但归结起来，是要落

实到实处和经验反馈。这是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选择黎城县域的意义

针对中央对国家发展新部署和县域经济社会体所处的位置和特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研究小组会同北京圣鸿星经济研究院共同组建了“中国县域经济社会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同时进行了专题性的初步理论准备，结合地理、区域和人文特征，选择中国各大区域中的有效样本——县域，作为“知识创新工程”分课题研究，并将被选择样本视作处于经济全球化影响之下的，位于主要国际市场和现代工业之边缘地带的广大中国县域城镇中的中部地区具有某些显著特征的代表。（2003年10月～2004年4月）我们选择了位于晋东南地区的山西省黎城县域，作为首例中部山区县域经济社会体的研究对象，对远离大中型城市经济圈的山区县域经济社会体发展状况与大中城市接壤的县域经济社会体间的发展现况进行比较，研究它们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选择黎城县域的依据为：黎城是革命老区，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又是有着沉甸甸的中华延脉——中原文化的始原地。黎城也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1947年春，黎城就已经处在和平的怀抱之中。小平同志的“建国、建军、建党”的三大思想就是在黎城工作时期研究成型的，并在当时的“黎城会议”，也称“北方高干会议”上得到了全党的通过和发展，同时通过的有当时解放区的银行制度。历史上，黎城是中国实践计划经济和军事经济最早的县域。现在，她又从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它是怎样有效地实现依靠自身资源和力量，在跨越与发展、组织与创新，发挥优势特征与自立自强使自己由原人均收入300元，上升到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余元的卓越成绩，这对研究处于低谷区的中国县域

经济体在可持续性和可协调性发展等方面，为寻求中国山区县域健康发展科学理论有着其深远的意义。

研究框架设计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演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持续能力的强弱，不仅牵涉到国家综合国力，也影响着所在区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本研究课题的作用框架有三：

第一、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战略，寻求一种符合中国县域经济社会间特征和可平衡发展的有效依据，为中央和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研究中部地区提供有代表性的参考。

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应从中部地区着手的理论设计推出后，为中央调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境况，设计、规划、部署“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之战略提供实证资料以及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心向中部地区转移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为样本地决策层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指导，落实“三个代表”理论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心在基层，从县域乡镇着手提供理论佐证基础。

根据上述框架的设计要求，我们把研究重心放在黎城县域经济社会体由农业主导体向村镇工业启蒙至工业化和乡镇都市化转移这一进程中，对县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企业精英层的崛起、形成和民众心理、制度实效等进行调研。将调研着重点放在当地的一些家庭、政府相关部门、干部、企业是如何面对改革开放和在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迎接中国刚刚进入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之势的。

课题组在对山西省黎城县进行了为期 180 多天的调研后，对该县的社会经济、人文政治等层面的研究分析，得出黎城的崛起对中国中部地区的意义以及上述分析和研究目的在本课题研究中已被证明的成功要素，将为

未来的黎城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得到整体性延续，呈现出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奠定可能性。黎城是一处希望给予开发也已经开始开拓但又有待于提升的、蕴藏着巨大铸锻经济资源和能使利益具体化的资源存储地。具体将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

一、黎城经济社会形态形成因素

这一研究内容将从三个层面来进行——

1. 自然因素，包括地理区位、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影响等；
2. 经济社会因素，包括人口数量与素质、城镇都市化程度以及基础；
3. 历史因素，主要分析地区开发过程、人口经济重心空间变化以及地区差异和经济动态过程。

二、黎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文化素质、城镇都市化发育程度、投资强度等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三、黎城经济社会崛起机遇和发展条件分析

分析区域发展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潜力、教育、知识经济发展的波及能力以及县域政策潜力等；

四、典型经济崛起模式研究

包括不同类型的经济模式、产业特点、存留问题、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发展方向和途径。

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黎城的国际贸易与经济联接作用对本地经济社会的影响，特选择了着重在以下两大分项研究：

一是从国内市场的走势出发，怎样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与统筹兼顾系统、社会综合能力与所在区域的全局性要素联系起来，对其进行综合研究；

二是从黎城实际、特征和自主优势出发，怎样实现优势资源在县域经济运行中的三个主要元素达到既相互贯穿又彼此制动的效应。这三个元

素是：

1. 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发展需要，县域决策者已经研究创新出起到战略指导和能够支持决策的有效系统（现已制定出部分指标和决策支持元素，如《黎城县干部制度改革规章和操作规程》、《黎城县权力运行规程》、《黎城县预防腐败机制》），但贯彻应用率的评估系统和促进社会效力与应激源的评估系统尚需深化建设；

2. 提出和制定黎城县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对国际、国内、区域市场波动、风险的预测评估方案，即对以下项目评估：

- (1) 10 万吨粉末冶金生产及压件制品项目；
- (2) 150 万吨钢坯、50 万吨轧钢、50 万吨薄板项目；
- (3) 200 万吨生铁项目；
- (4) 300 万吨原矿及 100 万吨精矿粉项目；
- (5) 7.4 万吨工业硅及 1000 吨多晶硅项目；
- (6) 1 万吨镁粉项目；
- (7) 1 万吨尖椒深加工项目；
- (8) 15 万只羊屠宰加工项目；
- (9) 1 万吨核桃深加工项目；
- (10) 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 (11) 吴家庄水库项目；
- (12) 20 万亩退耕还林工程；
- (13) 200 公里通道绿化工程；
- (14) 1200 亩植物园工程；
- (15) 道路网建设工程；
- (16) 文教产业工程（“四个三”教育兴县工程、体育馆建设项目、县城宣传文化中心）；
- (17) 3 平方公里城东新村——2.5 平方公里文化行政区；
- (18) 4 平方公里工业园区；